

修一座“起码通车了”的大桥真不容易

邓海建

近日，广西梧州市民打热线电话投诉，称当地交通干线桥梁“桂江一桥”经过近一年的整修重新开通，结果大桥路面竟出现裂缝。裂缝让桥面看起来呈波浪状，驾车驶过的感觉像是在骑马。梧州市市政管理局局长梁冰说，“我们政府是有责任的政府，宁愿先通车，通车虽然路难走点，质量差点，但是起码通车了。”（《北京晨报》9月28日）

有幽默的地方官员和彪悍的走秀专家在，你很难说那个诡异的路桥究竟是“豆腐渣”还是“一朵花”。“桂江一桥”修了又修，结果还是“扶不起来的阿斗”，市

民虽不是孙悟空、却也百炼成钢——说“我都是看着前面的车有没有掉下去我才走的”，地方市政管理局的官员回答得更神奇，“质量是差点，但起码通车了”。这话推理起来有两层意思：一者，公共部门以“通车”为修桥的底线，这也算史上之最，起码此前的“歪歪”或“脆脆”羞答答还没有这份勇气；二者，将“通车”等同于政府的责任心——这究竟是埋汰了公共责任的内涵还是侮辱了地方政府的智商？

“大鹏之功，非一羽之轻。”梧州“桂江一桥”之殇，并不在于某个官员的态度，或者说，它是又一个路桥事件的标本，寄寓着普适性的公共价值：比如，加

铺沥青“马蹄脂”的材料稀缺、桥面裂缝的提前发现、整体验收的未能完成，这一切竟都没能阻碍梧州“桂江一桥”大修后如期通车——“如期”二字，不过是公权对建筑规律的又一次践踏，要“献礼”、要讨吉利、要人政绩，哪还管得上路桥是不是“早产”？比如，大桥大修后刚刚通车，就起了裂缝，裂了之后现在又铺沥青——依然没人对浪费的公共财政感到痛心，权力的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都止步于路桥的现状之上，决策的问责机制、多元监督的倒逼之力，在“桂江一桥”面前早已被忽略不计？

短命而多弊的路桥，早就不是一个“良心”命题。看此起彼伏的路桥事件，

真可谓“网事”不堪回首：远的不说，就今年7月，足够昭示中国路桥质量的现状——7月里来，路桥很忙，忙于塌裂——18日，大连市在建隧道发生塌方事故，12人被困其中，在此之前几日内，已有多起类似事故发生；17日，肇庆市封开县一段在建江滨堤路出现滑坡坍塌；15日，杭州市钱江三桥辅桥部分桥面突然塌落；14日，福建省武夷山风景区公馆大桥坍塌；12日，湘潭市芙蓉路路面坍塌……9月27日《人民日报》再曝路桥新章：甘肃省花80亿元修建的天水至定西高速公路仅投入使用80天就被迫停用并大修，路面损毁严重，地方交通厅称道路将全面返工，以前的路面需要全部揭掉重

新铺设。各有各的蹊跷吊诡，各有各的蛛丝马迹。

当路桥危机的背后隐藏着贪腐寻租或乱作为的魅影，茅以升老先生修的钱江大桥等自然就成了时代的“神迹”。是的，修一座“起码通车了”的大桥真不容易，因为比照眼下少数地方部门在路桥问题上的姿态，也许有一天，官员会再降底线，继续回应我们——“质量是差点，但起码修得还是很像一座桥的嘛”——这就譬如在道德堪虞年代，扶一把老人也必得被大伙儿推向镁光灯闪烁的领奖台——都不容易啊。

底线没守好、权力没制衡好，官场的雷人雷语不过是“出头的椽子”罢了。

微言快语

中国文化传统里许多价值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的，但是不可能作为将来中国的指导原则，也不可能成为新的意识形态。现代社会有公领域和私领域。在公领域，只有实行民主选举、司法公正等现代制度。私领域就是个人道德、人和人之间关系，儒家思想可以发挥作用。

——余英时

近两日，长春市市长对11起强拆拆迁致人伤亡案向全市人民道歉；郑州市城管在微博上对暴力执法道歉；上海地铁运营方总裁就追尾事故道歉……当道歉成为一种问责，能否阻止暴利拆迁、暴力执法，能否杜绝车辆追尾？道歉之后，相关部门做了什么，更是民众所关注的。

——21世纪经济报道

上午排队一个多小时，买一张10月1日北京至郑州的火车票，无票。我到黄牛转售火车票网站，看到很多黄牛加价销售我需要的车票。我联系了一黄牛并商定取票地点。律师提醒我从黄牛手中买票是违法行为。我能从黄牛手中买票吗？为什么售票处没票而黄牛有呢？

——郑渊洁

重要的并不是包的真假，而是别人相信是真货呢还是假货。假如你是郭美美这类富家女，就算你买的是假货，别人也会认为是真货。假如你不是公认的富家女，就算你买的是真货，别人也会认为是假货。现在你知道该买真货还是假货了吧，真假取决于你的财富地位。

——李小娜

每一个具备履行法律责任能力的成年人，在享受风险投资权利和高收益预期的同时，应有承担风险的义务。在市场经济中，那些在民间借贷中遭受损失的人，只要不是被欺骗或强迫而为，就应该后果自负，风险自担。而不要扯虎皮做大旗，把什么都往社会问题上扯。

——陈真诚

有人问我：陈光标，是个什么人？我竟一时语塞。慈善人物吧，不像！人家把家当都捐了的人，我们还叫不上名；娱乐人物吧，与人同乐，洋相百出，但专业水平太次；不过我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他一定是个新闻人物！但，我想给他的建议是：今后，老百姓只想听到你的慈善故事，不想再看到你的其他八卦的东西！

——朱伟

国际油价跌破80美元，中国不为所动。这些国有大企一阵儿说大赚，一会儿又说大赔。自己不按曾许诺的规矩出牌，就很难让人承认你是市场经济。既然垄断又亏损，国资委为何不对责任人撤职查办？！

——贺延光

美国老人追求年轻形象的重要一点，就是不愿意别人把他们当老人看。所以男孩子如果看到老奶奶过马路，千万不要头脑一热做出“搀扶老奶奶过马路”的傻事来！向老奶奶慷慨激昂地抛去两个媚眼，才是让她老人家高兴的事。

——FT中文网

发明了一个罪名。昨晚溜达时碰到某老友，抱怨自己当年上的大学差劲，出差找不到几个校友可以喝酒。我说你找我吧，我没校友，只有朋友。他惊问窝兄你也没上好大学。我怒问之：难道你不知道我是著名的严重缺乏学历犯？

——咆哮女郎柏邦妮

“无需抱着希望开始，无需期待成功得以保持。”“满怀热情，不抱希望。”——这两句话是我刚来北京时听到的。第一句是张果老师告诉我的，第二句是本杰明告诉我的。当时觉得满怀热情容易，不抱希望很难。如今算做到了吧？真投入了，不抱希望是假，不因希望而大起大落是真。皮实了对吧？

——咆哮女郎柏邦妮



记者观察

“短命高速”让政府公信力再受伤

张鹏（《中国青年报》记者）

投资87亿多元建设的甘肃省天水至定西段高速公路，是连接我国东、中、西部的骨干道路——连霍（连云港至霍尔果斯）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通车不到半年竟出现坑槽、裂缝、沉降等重大病害，部分路段不得不铲除重铺，当地居民将其称为“豆腐渣工程”。

稍微了解甘肃的人，都知道天定高速之于甘肃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其东至庆阳、平凉、天水、陇南，西可辐射定西、兰州、白银等市，向南可接成县连接武都，进入大西南，向北可向陕西延伸。其对破解甘肃发展之交通瓶颈，增加东进西出的货运，发展现代物流，振兴甘肃东部区域经济，均有深远影响。

一度，这条西部新高速被寄予厚望。孰料，通车不到3个月，竟已病入沉疴，被迫重修。从目前已披露的信息来看，天定高速之病因有三：一者，造价偏低，先天“营养不良”；二者，赶工期，欲速则不达。三者：监管失效，形同虚设。

“缺钱”是客观原因。在欠发达的西

部地区修路，是一件难事。修高速路一次性投资规模大、资金回收周期长，远非一省财力所能为。加之西部车流少，相较东南沿海，很难吸引到外部资金。天定高速路的资金来源中，国家安排中央专项基金16.02亿元，其余资金由甘肃省财政、省公路建设资金和国内银行贷款筹集。全长235公里的天定高速，预算总投资87.5亿元，这意味着地方财政要承担大头。随着原材料、土地使用等相关税费、人工费用的不断上涨，高速路的造价也不断提升。有数据显示，京珠高速公路粤境南段，有的地段，每公里仅土地使用的税费就达3500万元以上；而天定高速公路平均每公里造价约3700万元。

相比于“造价低”，赶工期和监管不严，是更重要的原因。

甘肃省交通厅工程处官员在回答记者“为何冬天还要铺沥青路面”的提问时说：“这不是我说的，也不是我能决定的。”为了赶工期，从而忽略对质量的追求，这在诸如地铁坍塌等事故中并不鲜见。尽管我们已经为“高速度”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但是，赶工期依然是交通道路建设中无法摆脱的“紧箍咒”。上述官员坦言，浇筑

浮出

温州市永嘉人施晓洁2009年前后以为当地龙头民营企业顺吉集团融资为名，以高利率向社会筹集约13亿元。施晓洁与丈夫刘晓颂9月21日携带这些资金潜逃，数日后被永嘉警方抓获。据部分债主反映，这起集资案中的债主，相当一部分是永嘉当地有一定级别的公务员。（《21世纪经济报道》9月28日）

漫画：徐简

沥青的最佳时间是7、8、9月，可为了赶工期，部分路段不得不在冬天铺沥青。专家的初步调查结论也显示，不良环境下的施工，为路面出现坑槽埋下隐患。

倘若以上两条“事出有因”，监管单位形同虚设，导致无效监管，就决不能姑息。作为监管单位的甘肃省交通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难辞其咎——病因早已种下，为何监管者却毫无察觉，使其“顺利通车”？而这一切的背后，受伤害的是地方政府的公信力。

天定高速公路问题曝光后，舆论纷纷质疑，其中是否有人祸因素？是否存在贪腐？对此，地方政府不能回避，也不应回避。可遗憾的是，27日省政府的新闻发布会对此避而不谈。显然，这引起了舆论的再度不满，网络上的各种质疑和批评不绝于耳。

其实，此类舆论监督事件，“拖”和“瞒”是不解决问题的，不要以为“拖”一时风平浪静，“拖”一步海阔天空。殊不知在一次次傲慢和懈怠中，消耗的是公众的信任，是政府的公信力，抬升的是执政成本。

百姓说话

诺奖得主的“教育药方”更像讽刺

张魁兴

贫富差距如何消除？诺贝尔奖空缺怎样填补？针对当前让中国人备感纠结的几个问题，参加“2011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的不同领域的诺奖获得者开出了同一“药方”——提高教育质量。（《中国青年报》9月28日）

原以为诺奖得主的建议会怎样不同凡响，没想到他们开出的“药方”太没有技术含量了，因为教育优先、教育事关国家未来等早已写进政府文件，甚至被纳入国策。然而，这一再朴素的“药方”是我们绕不过去的：日本靠发展教育，国家强大了；荷兰6000万人口，竟有2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也得益于教育。我国在政府文件中在国策上都非常重视教育，那为什么一个诺贝尔奖获

得者也没有？为什么贫富差距的形势越来越严峻？

人家重视教育是真重视，可在我国，“再穷不能穷教育”的响亮口号还要真正落实。很多官员谈到教育，总是把缺钱挂在嘴上，其实不重视教育，根本原因是我们的一些官员对教育缺乏足够的重视。事实证明，穷县也可能办出富教育。

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各级财政都有了跨越式增长，无论是中央财政还是地方财政都有了不少重视教育的资本，但在教育在一些地方还没有被真正重视起来。中央对教育的投入始终没有达到4%的目标，一些地方政府对教育支出的积极性还不够高。表面看是缺钱，实际上是他们的钱都有比教育“更重要”的用处。比如，国家级贫困县湖南娄底新化县想的是投资建设寺庙景区，甚至还强令村民筹集资金。多

数地方政府首要的任务是多建上级政府官员能看到的政绩工程，比如漂亮的政府大楼，宽敞的迎宾大道，至于事关千疮百孔的教育和老百姓的生活如何，根本不某些官员的考虑范围，他们怎么会重视教育重视民生呢？

诺奖得主给我国开出的“教育药方”，更像是无情讽刺——你们不真正重视教育，永远也走不出贫富悬殊的困境，永远也无法实现诺奖的突破。如今的现实是，农村教育资源贫乏，重点高校的农村大学生越来越少，教育无法承载改变贫困、实现实际转变的重任，特别是在农村教育急需提振、新“读书无用论”再度泛滥之时。

重视教育必须落实到实际行动上，唯有如此，才能拯救教育，才能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

你所不知道的宁陕免费教育

方明威

陕西贫困县宁陕将财政收入的近四成投入免费教育，今秋开学起，当地所有学龄前儿童将可免费上幼儿园。对此，9月28日主要媒体的评论均是一片盛赞。

笔者的老家在陕西白河县，与宁陕同属安康市管辖。虽已外出多年，但毕竟在老家的教育系统工作过，一些基本情况还是了解的。宁陕之所以能推行免费教育，有几个原因是大家可能忽视的。

首先，是主政官员系教师出身，有着浓厚的教育情结。陕南山区由于文化较为落后，官员来源渠道也相对单一，一直有从教育系统选拔“笔杆子”进入行政系统的传统。这些教师从政之后，对教育当然也相对重视。宁陕县委书记陈伦宝就是乡

村小学教师出身，对教育肯定有着非同一般的感情。有从教经历的官员与没有从教经历的官员，对教育的感情和认知程度显然完全不一样。

其次，相对宽松的GDP考核压力，为政府兴办教育创造了政治环境。陕南山区多为国家级贫困县，交通不便，工业发展相对缓慢，因此上级给当地官员GDP考核考核的压力不是很大，不像经济发达地区往往将官员升迁与GDP直接“挂钩”。宁陕先后被确定为全国生态示范区建设试点县、全国天然林保护工程重点县、退耕还林示范区等，其发展战略是“养山护水，生态立县”，因此，经济发展指标就不会像紧箍咒一样使官员绷紧“发展的神经”，从而使政府有“空间”发展教育，把财政收入多往教育投。

第三，办教育政绩突出获得提拔，这产生了示范效应。以前在陕南山区，办教育被视为官员的一项重要政绩，突出者可获得提拔。据我所知，就有数人因此而提拔至市、省有关部门任职。这些官员的提拔可以视为其他官员起到榜样作用。

如果陈伦宝书记不是教师出身，如果宁陕也有沉重的GDP考核指标，如果教育办得好的官员不被或很难提拔，那就很难想象在这样一个贫困县，免费教育能推行得下去。

我丝毫没有否定宁陕免费教育的意义，只是衷心希望每一地的主政者都要有深厚的教育情结，GDP考核的压力不要太大，重视教育并作出成绩的官员能获得提拔，从而为发展教育创造天时、地利、人和的好环境。

冰点时评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已进入一个非常敏感和关键的时期，尤其是绝大多数普通劳动者缺乏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消费能力，这直接影响到消费社会的构建

掉队的工资增速 怎能造就消费社会

贺方

近日，由新华社经济参考报驻邦人力资源研究院发布的人力资源指数显示，虽然多数城市工资总额在提升，但扣除物价因素后，实际工资多数呈下降态势。以2010年1月为基期，全部15个城市4个行业，实际工资仅增长1%；与2010年6月相比，实际工资下降5%。这表明确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增幅没有“跑得过”物价增幅，实际收入同比下降。（《上海证券报》9月28日）

不少网媒转载时用了“工资增幅跑输CPI”的标题，这并非确切表述，因为工资收入只要在扣除物价因素之后还呈现增长势头，就说明工资增长跑赢了CPI，否则实际的工资收入就成了负增长。不过，更要看到，虽然工资增幅跑赢了同期CPI，但实际工资收入的同比增幅是下降的。这意味着，同比增速赶上CPI增速的工资收入，在扣除物价因素后，实际增速越来越小。

这折射出一个严重问题，即当下对于大多数普通劳动者来说，其工资增长只能维持基本的“温饱”，只能勉强跑赢通胀的速度稍微快那么一点点；如果通胀保持现在的发展态势持续下去，即使如此微弱的优势可能都难以保障，普通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出现负增长也是不可能。这种情况下，即便劳动者和自己的过去比，都只能说勉强不掉队，若要与物价与国家财政收入增幅与经济发展速度比，则处于明显的掉队状态。

当下，之所以从国家战略部署层面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诉求，都指向收入分配改革，更加重视保障和改善民生问题，是因为如果不尽快调整已严重失衡的收入分配格局，不仅会对社会的和谐

不同观点

谁说陈光标高调慈善就不可以

邓聿文

陈光标的毕节慈善演唱会又一次引起公众争议，这很正常；不过，争议愈来愈有两个方向发展的趋势——以网民为主的草根群体，大都赞同陈的高调行为，至少是不反对；而一些慈善人士、学者及部分媒体人士，则基本持否定态度，将陈的高调行为冠以“暴力慈善”的标签。

批评陈“高调慈善”者，理由无非是：一、陈的“高调慈善”为的是吸引人们注意，慈善不过是陈表演的“道具”；二、陈的高调慈善不重结果，被捐赠者并没有享受到相应好处；三、陈的“高调慈善”不顾及受捐者的个人感受，对他们的尊严是一种压迫。结论是，陈的“高调慈善”有害于慈善的发展。

虽然前一阶段有媒体指称，陈光标很多慈善捐赠没有到位，或夸大其事（对此陈光标进行了反驳），但至少在他几次被一些人诟病的“高调慈善”里，人们在现场看到的是真金白银。从媒体披露的现有情况来看，多数人还无法得出陈光标光说不练“假慈善”的印象。

至于说陈的慈善行为的实际效果很差，这不能由陈本人完全负责。陈的主业是办企业，尽管现在慈善家的光芒已经盖过了他企业家的身份。他和他的团队当然有义务监督其慈善的落实，倘若受捐者没有享受到其许诺的捐赠，陈是要负部分责任的。但如果认为这是其高调行为引起的，则把两个不同行为混淆在一起了，除非陈是诈捐，否则，最多只能批评他办事不严谨，后续事宜没做好。

更进一步说，高调与否是个人的行善风格问题。只要是真行善，即使在行善方式上如陈光标一样出一点格，也应该得到宽容。何况，我们都批评中国人缺少个性，循规蹈矩，不敢表现，现在有一人挺身而出，以自己的风格，高调行善，这又有什么不好？不管这个人叫陈光标，还是李光标；也不管这个人企业家，还是慈善家或别的什么家，慈善本来就该多种形式，社会本来就该丰富多彩。